

近年来,中国作协不断延伸工作手臂、扩大工作覆盖,面向包括残疾人在内的各个文学群体,推出了一系列有针对性、有实效的工作举措。7月1日至7月12日,鲁迅文学院残疾人作家研修班在京举办,来自全国各地的38位残疾人作家在鲁迅文学院深入学习研修,通过专家授课、改稿会、读书会、小组研讨、文化沙龙等丰富多彩的教学活动,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文化思想,努力提升文学创作水平。本报特刊发部分学员的文学作品,展示残疾人作家的创作风貌。

——编者

村里的空房子越来越多。院子还在,屋子还在,只是人走远了。屋里的旧床、旧柜、墙上的旧照片还在,院中的老翁、老树、随手扔在一旁的笤帚还在,但只有四季的风抚摸着这里的白天与黑夜,只有时光没有忘记告诉它树叶该绿了该黄了。

在村里随便走走,就能看到很多常年带锁的门。我在不长的过道里就看到五个。还有四五个虽然没带锁,但也是空荡荡的,院中只住着一个七八十岁的老人。或许老人更像个空院落的一部分,被一起遗忘了。很多老人都成了一个院子最后的留守者,用最后的岁月给予一个院子最后的陪伴。老人什么时候走,院子也就什么时候荒了。

一块块地方荒芜了,就像一个个牙齿掉落了。我的村子,真的老了吗?我看见门前那一处被遗忘的院落。我活得虽然不够长,但已经见证了它的三生。

那个院落的第一生,在我十一二岁之前,准确地说,我的童年看见了它第一生的结尾。那时候,胡同里的人家还没有翻盖新房,胡同还是弯弯曲曲的。我家门前正好有一个弯,弯的那边就是那家人的墙头,墙头只有一人高,为了减轻墙头上半部分的重量,而垒成镂空的,所以什么都挡不住。

那家人的说话声会跑出来,拾掇杂物的碰撞声会跑出来,饭菜的味道会跑出来。多少个夏天的上午,我和几个孩子在门前玩儿,就看见那高出墙头好多的石榴花特别的红。那时的我也因为石榴花的美丽而觉得那个院落里的人一定特别幸福。

那家的主人是一对老夫妇,我印象中他们六十多岁的样子,总是穿浅色的衣服,干干净净。住在这个院子里的还有他们的闺女、女婿和外孙女、外孙子。他们的外孙子和我们同岁。但在我们这几个一起玩的孩子看来,他和我们不是一个档次,因为他说话天马行空。我们经常笑他傻。其实这傻,只是姥爷姥姥的宠爱让他的天真比一般孩子消失得晚罢了。如今他成了一位基层干部。

他家不是不说话的,也不是爱出头的,在胡同里不显眼。留给这个胡同的画面,就是干净的老太太摇着蒲扇,坐在胡同的树荫里和邻人闲聊,温和地笑着,笑得像有什么喜事一样。老头则不慌不忙地拾掇着。那时候,每个院落里都能听到欢声笑语,家家户户都过得踏实悠闲,人们看不见别处,仿佛这里就是世界的中央,这里就是最幸福的地方。

后来,女婿的单位分了房子,老头去世了,老太太就跟着闺女进城了。从此,留在院中的只有那棵石榴树了。不知又过了多久,在一场大雨中,一声轰鸣,那个院落的墙头倒了。院中的石榴树、水缸、低矮的蓝砖房子都暴露在胡同里,仿佛成了胡同的一部分,不再是谁的家。从那时候起,那个院落也进入了它的第二生。

我家门前也就多出了一片天空,别人门前都看不见落日了,我家门前还能看见。一点也不刺眼的红太阳照着我家的门口,让进出的人脸上泛着红光。没有墙头的院子,被草上覆盖了。窗前、水缸旁、倒塌的墙头上,草茂盛着,有的还会开出几朵小花。

主人把它忘了,人们仿佛把它的主人忘了。只要别动把它占为己有的念头,它就是那片荒原。这个过道的人们把拆房留下的檩条、椽子放在这里。不用的水缸在院里碍眼,也搬到这里。从地里拉回的树枝都堆放在这里,自家院里就少了一个柴垛,一年都宽敞了。这里不属于谁,又仿佛属于各家,是各家的回收站,所

眼看已闷了三月时间,我还是失魂落魄样,待在家里大门不出二门不迈,像个大家闺秀。

妻子看在眼里急在心里,强装笑脸故意打趣:“如果你是女人,可坐得个月子哦。”我听了没一点反应,她就收住话题,更快地退出房间。

这天,几只鸟儿早早地在晨曦中亮起了歌喉。我起床捶捶发木的脊背,禁不住趴在窗台上向外张望,片刻,无奈地叹口气,重新躺倒在床上。

听见动静妻子进了门,坐在我的床边,拉拉我的胳膊,试探着说:“走,别闷了,今天我们去农村老家把那菜地种了。”

我本想去习惯性地给她回一句:“你去,我不去。”就在这当儿,窗外“啾啾”的鸟叫声欢快地响成一片,仿佛这些小精灵们的盛大音乐会起了头。我有些神往,顺着妻子的话,脑海中浮现出老家院里春的灿烂光景,就有些心动。

妻子看出了我的犹豫,赶紧趁热打铁:“你放心,不会有人的,清明都过了,哪里还能见人影?”我想想也是,青壮年到现在都打工走光了,老的陪着上班并校几乎全去了城里伺候小的,应该也不会遇见什么人。

一个小时后,我们的车停在了老家门口。妻子先从车上搬下来育着蔬菜秧苗儿的许多瓶瓶罐罐,紧接着丢下耙儿捞扫帚,马不停蹄地开始挖地、耙地,用铁锹整修着菜埂,不时发出“啪、啪”的拍击声。

她一边干,一边饶有兴趣地给我介绍种植计划:“东边这儿种茄子、辣子,过来点几株葫芦、黄瓜,西边那儿撒一些青菜籽儿,过了夏至,我们就有吃不完的菜喽。”末了,她好像是在自我感叹,又好像是在对我说:“只有耕耘才有收获哟!”

我蹲在地边,用手捏起潮湿的泥土,嗅着清新的泥土味,听着妻子的絮叨,冰封三月的心慢慢融化。我想象得出,过了夏至,院子里巴掌大小的这块地,紫的茄子,绿的



院落三生

刘 厦

有该扔但又搬不动或者不舍得扔太远的,都放到了这里。但也有不知趣的,将西瓜皮、烂菜叶、鸡骨头、洗衣服水、泔水倒进这里。这让我感叹,这一片废园竟有如此大的包容,那么多的垃圾、污物聚集,它依然年年青草茂盛,而且因为有食物,这里也成了野猫野狗的出入之地、蚊虫的乐园。冷落、蔑视和侮辱,反而让它生机勃勃。

这里在变成荒原之后,竟长出了一棵槐树。它是砍掉的那棵树的死而复生,还是谁将树枝插在这里,没有人知道它准确的来历。但它在废墟上,跟随季节,准时发芽、开花,并在秋天,在路过的人的忽视中,落下所有的叶子。没几年,它就长得可以给路过的人乘凉了。

它的第二生跟第一生相比,已经面目全非了。唯一的证物只有那棵石榴树和那三间低矮的蓝砖北屋。石榴树还会在初夏开花,花还是那么热烈,还会在中秋挂满裂开的石榴,除了偶尔有一两个忍不住诱惑的孩子和大人走进废园摘两三个,大多数都成了家雀、野雀的美味。而北屋就安静多了。没有锁的木门,抽丝的窗棂,反碱的墙,一遍遍被雨水冲刷着,被风雕刻着。沉默中经受着属于它的白天与黑夜。没有人进出过它,它就变得越来越神秘了。

二十多年里,这个院落没有说过一句话。多少个春天的早晨,它在湿润中返青;多少个夏天的午后,它聆听着乘凉人的闲聊;多少个秋天的傍晚,它迎着收获的车辆;多少个冬天的夜晚,它被白雪覆盖;多少个普通的日子里,它等待着放学的孩子打着伞回家;多少个春节,它看着各家各户在欢声笑语中挂起红灯笼。老刘家终于盼来了大孙子,它在那;娶亲的队伍撒落一胡同的喜纸,它在那;八十多岁老人寿终正寝,它在那;给突发急病的黑人送殡的哭声路过,它在那。它看着那么多人,从这里离开,踏上了远行的路;它看着那么多人,在离开多年后,从远处归来;它看着那么多人,从穷变得富有;他看着那么多人,从幸福变得不幸;它看着那么多人,从年轻变得苍老。

一张明信片

章新俊



辣子,身披毛刺的黄瓜,挂着晶莹露珠的菠菜,保准儿会像往年一样热热闹闹挤满整个菜地。

“哇当!”铁皮院门这时被人猛地推开。我站起身,循着声音张望,心却一阵紧缩。

“是,是哑才哥。”妻子显然也很诧异,话音还未落地,哑才哥就“嗯嗯呀呀”嚷了起来,好像发现了外星人。我缩着的心放松了下来,就憨憨地笑。

“哑才哥与你握手呢!”妻子的话点醒了憨笑着的我。我刚伸出手,一双粗糙的手便握住了我,又迅速地松开,然后两只有力的胳膊紧紧抱住了我。

我也不由抱住了哑才哥,瞬间眼睛酸酸的,有些想哭。这是我亲爱的哑才哥,我从小形影不离的玩伴。那时,我跟着哑才哥一起上下学,一起写作业,一起看书话理想。我记得,一个夕阳染红天边的傍晚,我们在村外的一棵老榆树下看书,哑才哥一口气读完了一本《百慕大三角》,抬头看着天边炫目的晚霞,眼睛亮亮地对我说:“我们要好好读书,将来走出大山,去探寻这个神秘的世界!”

然而,在小学毕业考试前,哑才哥生了一场重病。高烧昏迷数天后,一直求神婆保佑始终不见灵验的大人才慌了手脚,等他们急急忙忙将哑才哥送去去医院,却早已错过了最佳治疗时间。从此,哑才哥走进了无声的世界。他的名字“亚才”从那时顺理成章被写成了“哑才”。

见到我的哑才哥很兴奋,他又用一只手扳着我的肩膀,对着我“嗯嗯呀呀”地一阵说,还顺势拉住我的胳膊。我心里没谱,

就抽着胳膊,赶紧握手。“哑才哥比画的应是请你到他家去做客呢。”听到妻子解释,我坚决收住了脚步。我知道哑才哥的家并不远,知道哑才哥的一片诚意,但我无法挪动脚步。

我的推脱,让哑才哥想到了什么,他松开了我。“哑才哥要帮我栽菜苗呢,我拗不过他哦!”

“他以为我不去,是我们的菜地还没有种完,所以就帮你赶紧种菜呢。”我猜出了哑才哥的良好用意,给妻子说着,心中同时泛起了锥心般的酸楚。

哑才哥那年失聪后无奈退了学。每当我去探望他,哑才哥大颗大颗的泪水像开了闸门,冰冰凉凉地涌入了我的心里。上中学前,我翻出炕席下皱皱的几张零钞,上集镇挑选了我认为最好的一件礼物送给了哑才哥。那是一张当时很流行的明信片,明信片上是一匹骏马,朝着旭日,昂首奔腾,勇往直前。后来,听说哑才哥挥起长鞭,当了羊倌。再后来,哑才哥学着垒墙盖瓦,常年在外务工,成了工地上的一位有名的好把式。

我工作后回老家,每次看到单独居住的哑才哥的房门开着,总要带着妻子进去坐坐。哑才哥身子一人,但他的房屋什么时候都干净整洁,物什摆放永远是那样

直到一天早晨,我被三轮车的轰鸣声吵醒。父亲说对门回来了,正收拾呢。

那片被丢弃太久的荒地仿佛一夜之间被主人意识到了珍贵。邻居们看见了寒暄一番,问问有什么需要帮忙的,再问问主人的打算。主人依然笑得像有什么喜事一样地说收拾收拾,再垒上院墙。人们便开始猜想主人的意图,要卖了?要做买卖当厂房?但可能性最大的是老人要回来了,要在老家支应丧事。我们村所有空院子在空了多年后,都会迎来一场热闹。死了的人会彻底留下来,活着的人们会继续离开,直到再没有力气享用外面的一切了,直到所有的欲望都全部消失了,再踏上真正的归途。所以,有几个院子已经等来了几场热闹,他们仿佛已经成为一个家庭的专用丧事礼堂。

有谁家还要的物件谁家搬走,许多人家都少了一块搁置闲物的地方,有些失落却也无话可说。剩下的就全是垃圾了。主人雇了短工,一车一车地往外拉垃圾,拉了好几天,仿佛把这么多年来人们偷偷欺负这里的事儿都翻出来了,仿佛那一车车拉走的是这个院落多年的屈辱。

那棵石榴树又在五月开花了,火红的小花看到久别的主人回来,仿佛在风中欢呼雀跃。

没几天这里就干净了,重新恢复了尊严,又过了几天,顺着胡同边便站起来了高高的墙头,大门垛气派,黑铁门严肃,那棵树被关在了里面。

面对全新的封闭,我看见,那个院落进入了它的第三生。这第三生却是更加荒凉。

再没有扔东西的人进入这里,再没有小动物出入这里,这个院落再也参与不到别人的生活中,再也不能跟着别人的故事悲喜,再也见不到那些熟悉的人。下面的时间需要它自己度过,独自面对春去秋来。或许唯一的造访者只是飞鸟和流云了。

那棵石榴树,在欢喜了一场后,面对孤独的囚困,是否低头垂泪呢。

我听见,大提琴低沉的旋律在秋风中回荡。

一年后并没有看到对门任何动静,人们有些不理解这家人如此折腾的意图了。好像只是主人在土地越来越值钱的时候发现了是自己的幸运,急于向人们昭告这个地盘是他的财产。

我看不见院里的孤独,却看见巨大的孤独在院外翻滚。人们心中刮起的那一阵阵小风,终于汇集成了浩荡的秋风,扫荡着整个村庄。

这个村庄的每个人都在奔忙,而奔忙的动力就是“落在外头”。至少让孩子“落在外头”。这成为一个城里人势不可挡的流向,这个村庄里的每个人就像秋风中的事物,不能左右自己的命运。

试想二十年后,村庄里只剩下未能如愿进城的“失败者”生活在一个个长年带锁的空院子间了吗?或许,需要占地方的商人们会来利用这里慷慨实在的土地,那拥挤的都市人会来田间寻找一份心灵的释放,那游荡在他乡的游子会给故土系上一份乡愁,或许那些会让村庄再次热闹起来,但比城市辽阔多少倍的乡野是否只是城市的附属品、消费物?这里是否还有属于它自己的灵魂?

无论多么热闹,如果没有人将梦放在这里,这里再热闹也是秋天的喧嚣。生活在此处和在异乡游走的人们,他们都将梦放在了远处。他们的梦什么时候能回来呢?我看见,这被遗忘的院落,就像一位白发苍苍的老母亲,她站在秋风中,默默地眺望着,眺望着。

井然有序。一次,看妻子端详玻璃板下压着的那张明信片,哑才哥就给妻子指指我,咧着嘴灿烂地笑。

这时,哑才哥“嗯嗯呀呀”说着什么。“哑才哥让你把锄头递给他呢!”妻子及时给我解释,“我来拿给他!”

我站着没动,对着哑才哥的方向笑笑。“哑才哥让你提那个水桶过来。我去提!”我只好再对“嗯嗯呀呀”的声音笑笑。菜地种完了,妻子拉我走过菜埂站在院里,给我拍打裤脚上的土。

“嗯嗯呀呀。”哑才哥又说起了什么。“嗯,是的。”妻子回应着。

院子里突然老半天没了声,我正奇怪,哑才哥“嗯嗯呀呀”声又响起。“去看了,不行的!”妻子像是给我说,又像是给哑才哥比画着什么。

我又一次被哑才哥紧紧地抱住。他嗯嗯呀呀叫嚷着,双手拍打着我的后背,似悲号似怨恨。好大一会儿,他才松开我的胳膊,又抓住我的手使劲摇摇,然后出了门。

“哑才哥怎么啦?”我回头问妻子。“他刚才询问你的眼睛是不是出了问题,我给他比画你现在的状况,他抱着你一下哭了,不知又为啥走了。”

我的心稀里哗啦碎了一地,有一种刚结痂又被揭开的痛。我已不想在老家停留,因为再面对哑才哥,我怕自己三个多月蓄积的泪水会如江海决堤。

汽车缓缓驶出村巷。“咦,哑才哥怎么急急跑过来了?”妻子跟我说着,同时停了车,按下了车窗。

一个信封在“嗯嗯呀呀”声里塞到了我的手中。我将信封递给了妻子——眼睛看上去好好的,其实是盲人。三个月前,由于一场疾病,我双目失明,世界绝情地在我眼前拉上了黑厚的帷幕。

妻子打开信封,是一张明信片。明信片上,一匹骏马朝着旭日,昂首奔腾,勇往直前……

我家老屋后有棵银杏树,已经109岁了。这是爷爷出生时,他的爷爷栽下的,当时栽了五棵,现在仅剩一棵了。不知咋的,最近几年这棵百年老树长得格外好,枝繁叶茂、硕果累累,还往上蹿高了两米多,我和儿子两人手拉着手都环抱不过来。

父亲因病去世后,我将母亲接到城里居住。新冠疫情结束后,77岁的母亲坚决要求回老家生活,闲不下来的她在家前屋后种了几畦菜。今年是母亲的八十大寿,春节时我与母亲商量如何操办。母亲突然严肃地说:“这两天你抽空,找几个人把银杏树锯了吧。”

我猛地站起身,瞪大双眼,惊讶地问:“为什么?”

上世纪70年代初,父辈分家,最终父亲以给爷奶奶养老送终和少分半间厢屋为条件,争得了屋后五棵银杏树。那年,一岁多的我还不会走路,长势最好的银杏树还没有我的小腿粗。母亲常常用一根绳子,一头捆在我的腰上,一头系在东边第二棵最粗的银杏树干上。她放心地在自留地里侍弄着蔬菜,甚至随生产队的劳力们一起去远处的农田干活。

银杏树的北边,是一条东西走向的乡间小路。小路的北边,是大伯家。大伯比我父亲大五岁,与伯母先后生了两男一女,小儿子红武和我同岁。分家时,因为五棵银杏树,大伯的意见最大,闹得最凶。兄弟六人,五棵树,做不到绝对公平的一人一棵,更没有谁高风亮节主动放弃。爷爷奶奶坚持“谁得树谁负责养老”,经过两位舅爷爷和三位姑奶奶三个多月的反复斡旋,好不容易五棵银杏树分到了父亲名下。

我长,树也长,树的生长速度远远超过了我。随着五棵树的不断长粗、长高,我家与大伯家的矛盾日益升级。

太阳升起,树影躺到大伯家门前。大伯取来锯子,前几年锯掉了伸向北侧的树枝,后几年干脆锯掉了树头。五棵银杏树,成了五棵树桩。可是,银杏树太过顽强,今年锯,明年重新长。年复一年,父亲站在银杏树边,与大伯进行着激烈的“拉锯战”。

银杏树结果了,一串串地挂在树枝上。在白天的阳光和晚上的月光中都泛着金黄的光泽。最贵时,果子能卖到30多元一斤,对于普通农家来说,是一笔不菲的收入。这个时期的银杏树成了全家重点保护对象。大伯大娘的理论是“掉在谁家就是谁家的”,先是抡抬,后来发展为暗偷。成熟的银杏果,经风一吹,或用竹竿轻轻一打,即可掉落在地,捡起来就是钱。掉在大伯家门前的四分之一,自然归大伯家;掉在路面上的四分之一,大伯家人多,大部分也归大伯家。他们夜里又悄悄地爬上树……形势最严峻时,爷爷奶奶父母和我,晚上一人看一棵树。可是,本事极大的红武总能悄无声息地爬上树,又悄没声儿地摘下一串串银杏果,又悄没声儿地扔进铺在他家门前的棉被上。

进入21世纪,奶奶、爷爷、大伯、父亲相继离开人世,大伯家的子女没有考上大学也都先后到了外地打工。银杏果的价格一跌再跌,降到了每斤不到一块钱。昔日的摇钱树沦为食之无味、弃之可惜的鸡肋。自由落地的银杏果,开始还有人收拾,后来再无人问津,散发出一阵阵奇异的臭味,然后化入泥土。

一直想随子女生活却未能如愿的大娘身体硬朗,在我母亲进城后,就在我家屋后的自留地里种上了蔬菜。母亲发现后,问我怎么办。我淡淡地说:“你又不在于乡下,也不种,荒着也是荒着,大娘愿种就种罢。”

母亲不大情愿,咕嘟着说:“那她至少要和我说一说啊。”一年后,大娘打电话给母亲,说的却不是地的事。她直截了当地问我母亲:“现在银杏不值钱,你能回来把银杏树锯了吗?你没空回来也行,我帮你找人。”

母亲气愤地说:“不行!地让你白白种了就算了,锯树可不行,这是祖上传下来的,就剩这几棵树了,绝对不能败在我手上。”

大娘声音很大,隔着手机话筒,我都能听到。“你以为我愿意种你家那点地啊?一点阳光也没有,还全是树叶。不锯就不锯吧,这是你家的宝贝。”

可是,今年春节,母亲却突然要我把仅存的银杏树锯了,我百思不得其解。母亲平静地说:“我回来两年多了,乡下没几个人喽,想找人说话都难。你大娘也是一个人在家,八十几岁的人了,身体也不太好了。我到了后屋几次,那棵树确实挡住了她家的光线。我们还能再活几年啊?遂了她的愿吧。”

妻子接过话,“你也这么大了,你答应不再种地了,我们就把树锯掉。”

母亲张张嘴,没再说什么。我和妻子拎了两盒糕点,去了大娘家。大娘独自一人坐在堂屋打盹,冷冷清清,没有一点过年的喜庆。我叫了声:“大娘!”问道,“红武他们呢?”大娘慢慢抬起头,勉强挤出一丝笑容:“他们哪有空回来噢,打工的都要趁春节这几天多挣点房租钱哩。”

妻子坐到大娘身边说:“大娘!我妈说了,想找人把门前的这棵银杏树锯了。”

“锯树?要找人锯树?”大娘像被什么重物猛烈撞了一样,从座位上弹起来,大声问道:“树长得好好的,为什么要锯掉?”不由分说,她径直迈步走到我家,质问我母亲:“为什么要锯树?祖上传下来的,就剩这棵树了,你为什么要锯掉?你不要,我要!”

母亲满脸诧异,说:“老嫂子,你不做梦都想把把这树锯了吗?”“不锯!我说不锯就不锯!”大娘坚决地说。我们走到屋后的银杏树下,大娘背靠着树,喃喃地说:“现在没有这棵树,我都找不到家了。”

春节后,我请人将四个树根从地里挖了出来。其中的一个,加工成了圆桌;另外三个,从中间锯开做了六张木凳。五一劳动节和端午完美结合,我请人将屋后的自留地铺成了平整平整的水泥地,在银杏树南北两侧各安排装了两盏路灯。树荫下,摆上了之前做好的圆桌和木凳。

梅雨时节到了,天气闷热,暴雨在即。我和妻子再次回到老家。银杏树下,母亲正和大娘等几位老人围坐在一起喝茶聊天。



封红军